

香港 深度

MIRROR演唱会事故后——舞蹈员重回舞台笑脸迎人，同时在看精神科

“我们想要一个说法，一个原因，一个道歉，或者什么都好。但我们一直无法得到。”



李慧筠 (+)

端传媒记者 李慧筠 发自新加坡 | 2022-12-12

MIRROR演唱会事故

MIRROR

【编者按】2022年7月，香港男团MIRROR首次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在28日第四场演出至晚上10时半，舞

台中央一个LED屏幕松脱坠下，压伤舞蹈员李启言（阿Mo）的头部，另一名舞蹈员张梓峰（阿Fung）亦被砸中受伤；加上前期彩排时受伤的舞蹈员Zisac，总计有3人在制作中受伤。而伤势最严重、被压中颈部和头部的阿Mo，现在仍于私家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介入调查事件，并在11月公布，发现有人虚报器械重量，拘捕涉事演唱会的承办商“艺能工程”和“协兴隆”共5名职员。主办方MakerVille和大国文化早前发声明指，会咨询法律意见，保留追究的权利，亦支持港府相关改善建议，并会继续承担舞蹈员的医疗费用。

事件引发社会讨论演唱会前期多宗意外的原委、制作时间不足、安全保障是否足够等等。有份参与表演的舞蹈员一直鲜有公开接受访问，他们早前在网上刊登公开信，披露更多演唱会的制作细节。端传媒接触到其中一位舞蹈员，透露近日的情绪和生活、前期制作的细节，以及对舞蹈界权益的想法。

MIRROR演唱会事故后4个月，有份参与表演的舞蹈员P，一直强调自己身体和情绪相对健康。但P知道，自己摆脱不到事故带来的阴影。好几次，P看到街上电视屏幕播放MIRROR的新闻，嚎哭不停。“大家看似复原，令我感到有压力，因为我会想到阿Mo。这个落差，我到现在仍在处理。”

最近，几个为MIRROR伴舞的同伴，第一次重回演唱会，有人感觉不自在，萌生以后不再做演唱会表演的念头。也有同伴需会见精神科医生，医生提醒他们留意发梦的情境，脑中会否出现闪回（Flashback）；每次会诊仍会触发他们不断哭泣。至于P，则在这两个月以工作填满自己，“我不想见精神科医生，我信不过医生，而且我觉得没有人会明白。我宁愿相信自己。”

对P来说，一个答案至为重要，“我们很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P认为，LED屏幕是一回事，前期制作问题是另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上，P觉得政府事故调查进度一直未完成，而主办方MakerVille和大国文化也未交代演唱会前期制作的意外原委，更未有保证会负担伤者日后的生活需要及开支。长远而言，P希望舞蹈行业权益有所改革。

一夜之间，曾为MIRROR伴舞的其他23个舞蹈员，陷入伤痛和沉重的郁结，站在怀疑演出事业的十字路口。舞蹈员阿Mo颈椎重创，目前情况稳定，继续留医接受治疗。同伴的康复路漫长，其他舞蹈员也正面对舞蹈表演带来的恐惧，勉力在舆论压力中不致被吹倒。

而他们最害怕的是，公众会逐渐遗忘这一宗事故。

重返舞台，或考虑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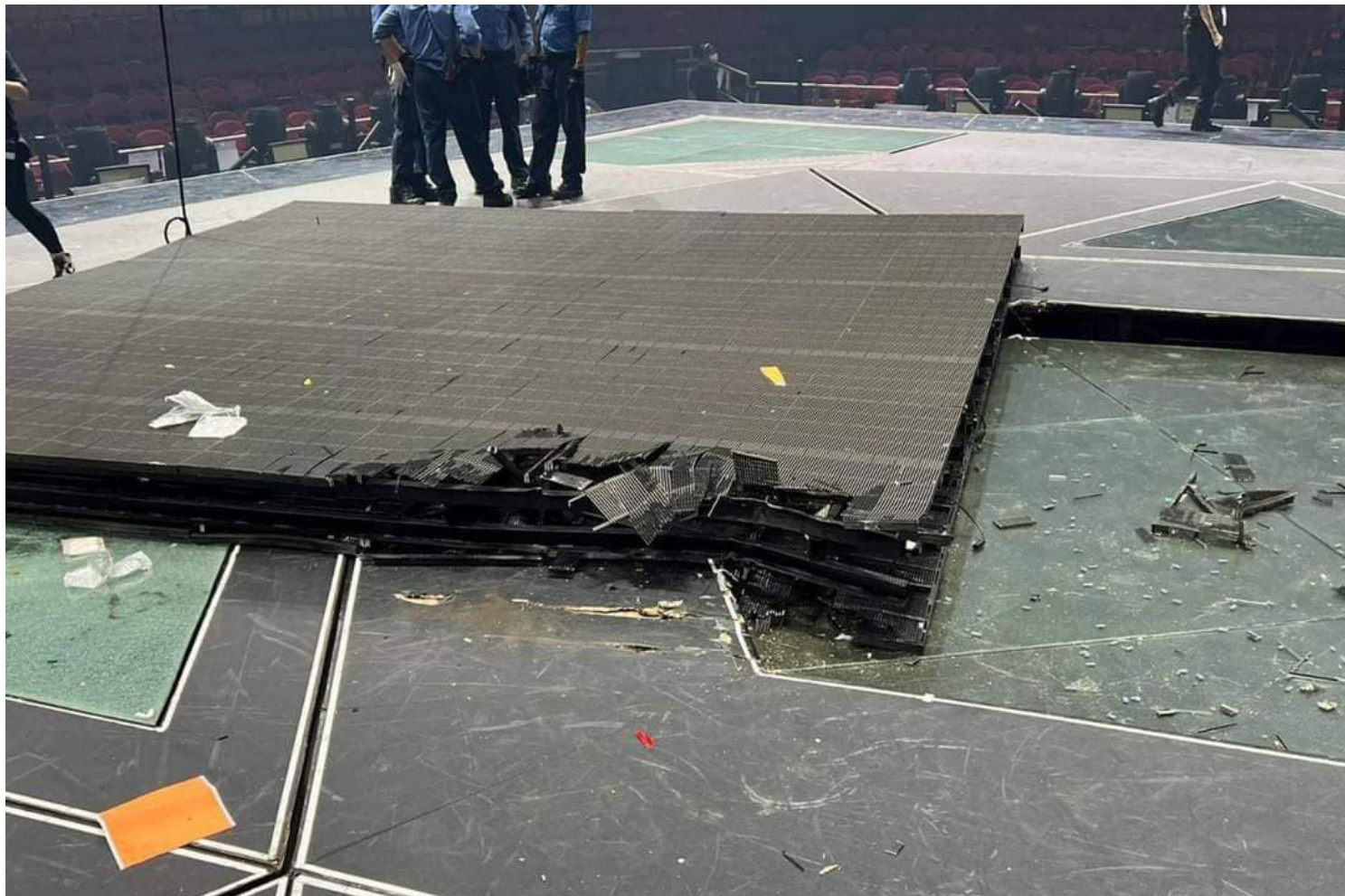
P在事发后休息近两个月，最近重拾活动演出，但尚未回到舞台。P说，有些同伴再次演出，有人专注在舞蹈室授课，有人一直会见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专家，也有人“待机中”，处于空白的“休渔期”。“大家都在试水温，感受自己会不会重回演出，或者到底何时复出？都是一个问号。”

“一些人情绪仍然很浓郁，但很尴尬，停工太久，真的没收入。”P说，“我们部分人已经重回红馆，但回到红馆工作，不代表已经康复。”

事故后，舞蹈员们维持紧密的联络。他们忙着到警署、劳工处落口供，并咨询律师意见，组织事故经过。外界对他们的各种期望也带来了巨大压力，像同业发来讯息，请他们把握机会为问题多多的舞蹈界争取权益。

“8个星期，每星期处理一件事，真的要疯了。”P觉得，那段时间，舞蹈员怕在风眼之中被利用，对外人并不信任，不敢接受陌生律师的主动协助，也不敢找记者，变得很抑压。他们觉得与彼此见面最有安全感，不时相约见面散心，留意着各人的情绪。

10月，舞蹈员们陆续重投工作。回到红馆的人，则重临凿下深刻创伤记忆的舞台、后台和排舞室，和与受伤同伴相处过的每一个角落。“那段创伤不只是事发那一刻的事。”P说。“每一刻都在挑战，大家都在努力表现正常，如果表现不正常，吃亏的是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努力的话，都很想前进。”而回到舞蹈室教班的人，重新接触一大伙学生也感到紧张。



2022年7月28日，香港，MIRROR演唱会进行期间，巨型显示屏突然从高处跌下，击中台上的舞蹈员，图为堕下的显示屏。网上图片

第一次遇上大型意外，只懂得跳舞的他们，对法律、保险等等认识不深；开初因为不敢找寻帮助，也错失了发声和推动的时机。近日，他们咨询律师意见后才有信心写公开信，还原细节、提出诉求。“原来不用怕诽谤，不用怕影响证供；但遣词造句、语气、铺排，我们也不断讨论。”

不过，公开信除唤起公众支持，也引发骂战。部分留言翻旧帐，指早前有舞蹈员未查清事实，便转发并斥责MIRROR队长杨乐文（Lokman）回应传媒的说法；也有人留言要求舞蹈员不要再借MIRROR的名义争取诉求。从事故开始，舞蹈员的社交媒体帐户就不断涌进留言和讯息，这次争议再度激发浪花，有些舞蹈员在表演休息期间，不断查看关心或攻击讯息。

P和舞蹈员，跟不少同是跳舞出身的MIRROR团员已认识多年，“MIRROR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我们一起建立的舞台、第一次的红馆演出；团队关系很Sweet，前期多危险也好，我们很期待这场Show。后来变成一件坏事，到现在还未有一个句号，（我们）还要变成‘架两’（多管闲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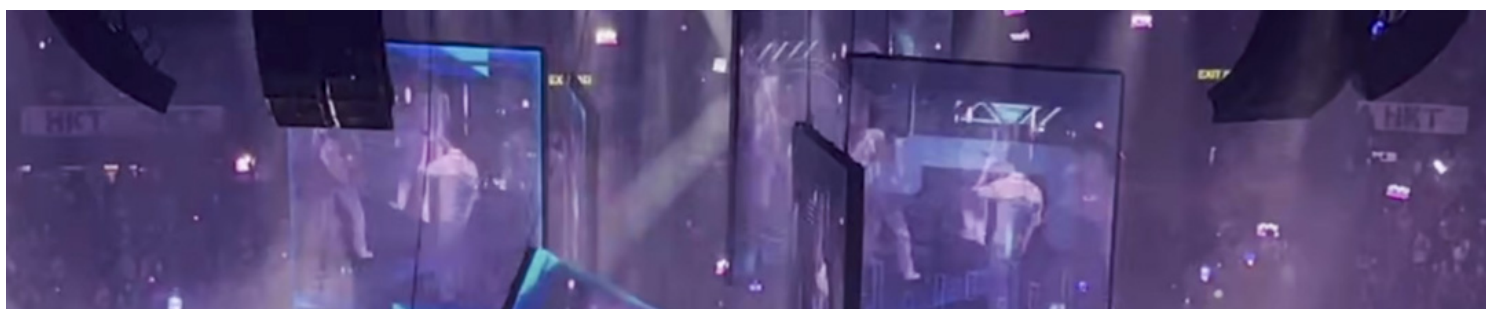
“这场MMA（综合格斗）很厉害，我们消化不到。”P不自觉地减少使用社交媒体，也常常思疑是否不应分享生活照片，“有人会tag我们问，你今晚还喝酒吗？你还有心情吗？”

“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事故发生的当刻，P指，台上舞蹈员直击阿Mo被LED屏幕压伤的一幕，观众的尖叫声深印他们的脑海。舞蹈员当时被指示下台后，在后台受惊嚎哭，场面混乱。有人倒在地上，无法步行，要人扶抱。他们互相扶持回到休息室，那短短一段路相当漫长。

在休息室，有的人持续哭泣，也有同伴咆哮大叫。P听到其他人的哭声也不能自己，“好恐怖、接受不到。我觉得身边的事物都好危险。”P说，“我当时整个脑都在想，没可能的！岂有此理？这是真的吗？”状况维持至凌晨约3时，一名资深舞蹈老师协助安顿部分舞蹈员到酒店休息。

一个想法缠绕着P。“那一刻，我们一直最担心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2022年7月28日，MIRROR演唱会进行期间，巨型显示屏突然从高处跌下，击中台上的舞蹈员。影片截图

7月25日公演前，MIRROR演唱会制作彩排时间不足、舞台安全成疑等消息早已不断传出。综合媒体资料和受访者说法，制作方于7月18日入红馆搭建舞台，舞蹈员于7月23日入台，这天原定计划是“踩台”，即走一遍舞台。但P指，他们实际上不断等待，“舞台还未准备好。”

那时，舞台上同时有舞蹈员走位、乐队排练、艺人测试吊索动作，“舞台很抢手。”制作单位只安排舞蹈员以15分钟排练一首歌，但按其演出经验，一首歌至少要30至45分钟排练，“就像要我以半小时完成全程马拉松，这是不可能的事。”

当天时间不足以完成踩台，舞蹈员在24日接续排练。P指，24日原定进行总彩排，但因机关问题改至25日凌晨1时半，期间，舞蹈员Zisac从舞台堕下受伤，又因有升降台无法升回原位，总彩排中止。“我们最后没有完成整个Full Run（总彩排）。”随后，舞蹈员和部分MIRROR团员在社交平台以黑图抗议舞台安全问题。

此外，P提到演出的工时比其以往经验要长，最长的一天工时约为17小时。“我们没有行程表，今晚可能不知明天什么时候开工，下班离开时口头交代，或在WhatsApp问。”

P说，“演出的Day1就是我们的总彩排，当日才知道整个流程。”

25日正式演出，舞蹈员仍遇上不少惊险状况。P说，制作方理应在演出前示范一次烟火效果，让舞蹈员熟习走位，但既然没有完成总彩排，也就没有看到喷发烟火的完整流程。另外，有舞蹈员被安排掀开烟火遮盖，但每次爆发时间、角度不一。当天有人Panic attack（恐慌突袭），说：“Zisac已经受伤了，为什么我们还唔担心㗎？”

P说，有舞蹈员出场后发现舞台漆黑一片，因为对舞台不信任，相当恐惧，“最后为什么会看得见？因为Fans的灯牌太光。”

当天，MIRROR成员AK（江焯生）在升降台上跳舞，期间舞台晃动；后来，全团在升降桥上演唱，天桥剧烈摇动。第二天，另一成员Frankie（陈瑞辉）失足从升降台跌下。意外短片在网上传播，引发公众质疑舞台安全。第三天，政府介入要求主办方改善，演唱会也改动演出安排、在吊台加设栏杆等等，演出最终顺利结束。

这段期间，舞蹈员一直感到不安。P说，“但是，升降顶多是地面的问题，我没有想到最危险的在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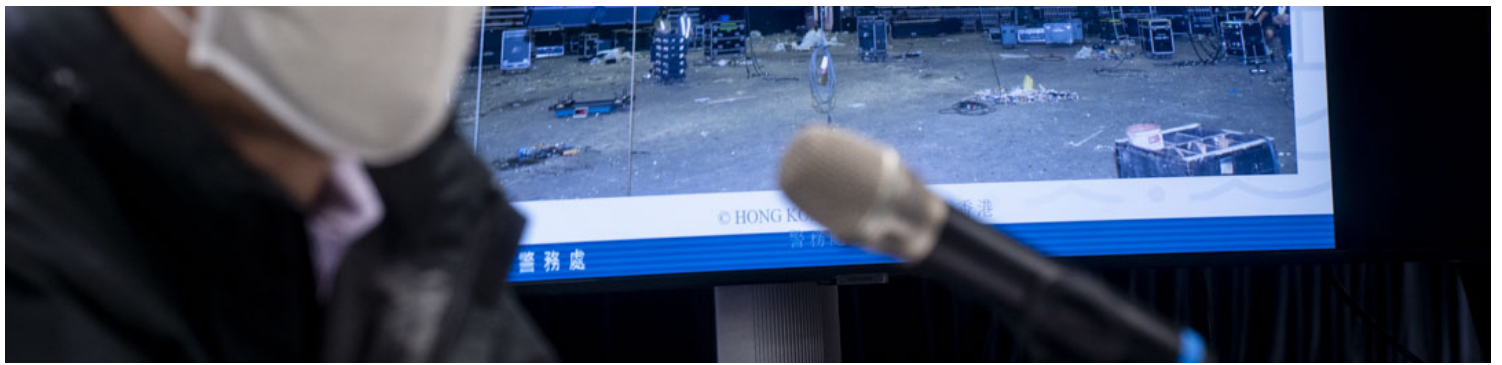
第四场的LED屏幕坠落，粗暴地煞停一切。

对于事故，P感觉矛盾。“你问我那一刻是不是很惊讶？很惊讶。我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是也觉得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个演出一直有问题。”P伸出右手不断挨近墙边，尝试作比喻：“我们一直很想避开，但好像被人推、推、推、推，推到一个位，事情真的发生了。”

现在回想，P觉得他们身为舞蹈员，在制作过程中不断屈就、“硬食”，很想以胆识和执生（应变）能力搭救，勉力拼凑错落的事物，最后却徒劳无功。“你很尽力很尽力，但最后仍然很糟糕，仍然是在做一件坏事。”

端传媒去信主办方MakerVille、大国文化，及母公司电讯盈科，查询相关升降问题及烟火效果安排等是否属实、制作及彩排时间不足会否与事故相关，截稿前未获回复。





2022年11月11日前，香港警察公布MIRROR红馆事故部分调查报告，指承办商艺能工程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虚报装置重量，以尽快获批举办演唱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没有守好的重重关卡

11月，香港警察公布部分调查报告，指承办商艺能工程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虚报装置重量，以尽快获批举办演唱会；各类装置的实际重量，平均超出虚报数字的4倍。其中，6个LED屏幕申报3600磅，实重为9852磅，是申报数字的2.7倍；喇叭装置的实重，甚至逾申报数字的7倍。

至今警方拘捕承办商的4男1女，他们涉欺诈、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等罪名，警方重申不排除有下一步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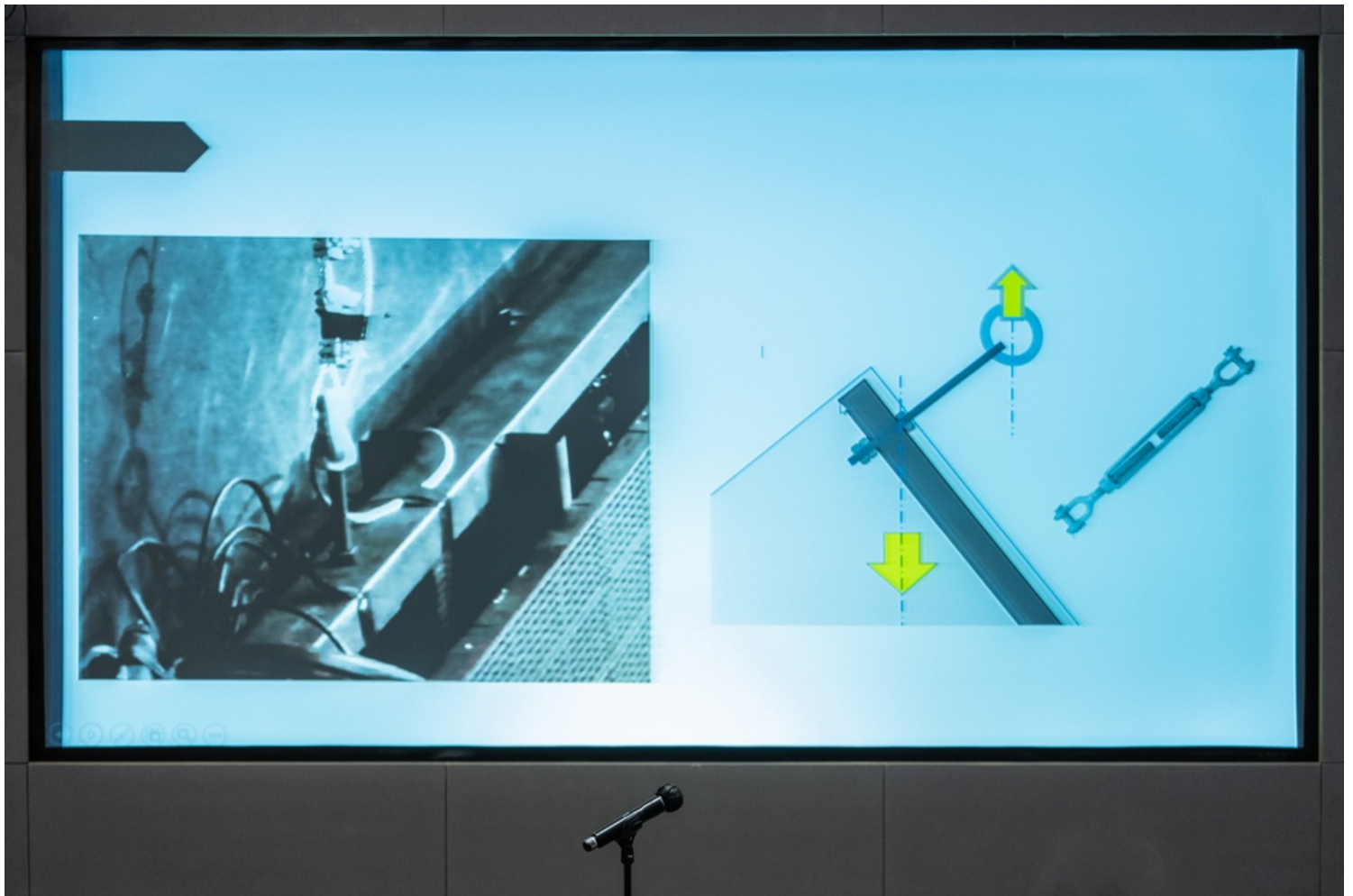
调查发布当日，不少记者问及政府和主办方的责任问题。随后，《明报》[报导](#)指按红馆《租用条款》，康文署红馆经理须事先批准悬挂器材重量图则，署方委派人士须在悬挂前检查整体装置。不过，署方未有回应有无在MIRROR演唱会的工程前做检查，重申租用人应确保装置安全稳固，指事故涉刑事调查，不便评论。

P得悉当天表演的头顶上有多样器械虚报重量，相当错愕。“政府康文署、二判协兴隆……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每个单位都出错？这个数字要经过好多关，而这么多关都没有守好才会变成这样。”P说，“现在说的是，红馆10几年来都是这样儿戏？”

P觉得调查报告和他们多年的认知有很大落差，“我们一直很信任舞台，很爱舞台，很相信监制。”P指指记者手中的笔，“原来你手中的笔长期用会中毒，但写了10几年才知道。我们知道更多后，下次表演还信不信政府？信不信把关的人？这令人毛骨悚然。”

另一方面，调查报告未能解答P的所有疑问，“谁要负责任的问题，其实未解决。”P认为，目前主办方MakerVille和大国文化未交代其独立调查报告的内容。交代不仅针对事故本身，更应好好检视前期制作的意外原委，“道歉、承诺、保障，没有人做过。”

P指，主办方于事故后和舞蹈员开会3至4次，达成协议会提供生活资助，但在交代调查进展上较为被动。他们和公司曾开会，希望公开调查报告内容，“我们想要一个说法，一个原因，一个道歉，或者什么都好。但我们一直无法得到答案。”



2022年11月11日，MIRROR演唱会事故工作小组专家顾问林超雄博士讲解事故中损毁的组件结构。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另一方面，P又感觉到近年演唱会制作的时间愈缩愈短，行内的追赶文化加剧。“我们学舞步很急，踩台很急，那么之前的安全检测急不急？是否就像调查报告所说，为审批速度加快而虚报数字？”P疑惑，舞蹈员除了跳舞，还要兼顾烟花效果、特技或演戏，“舞蹈员要Pick up不同能力，这件事健康吗？到底这代表大家是专业的，抑或其实是被逼做的呢？”

在存在“硬食”文化的商演舞蹈界打滚，P曾经相信the show must go on，也认同专业的舞蹈员不应轻易缺席表演。现在，P开始质疑舞蹈员是否有相应的责任，喝停一场问题处处的演出，“我们不是单纯受害者，我们没有call停表演。”

但是当时P也不确定，以零散工状态被聘请的舞蹈员有没有这个权力，“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个能耐，亦不够胆这样做。”事故后，公众和媒体提出关于“假自雇”的质疑；劳工处其后审视舞蹈员工作模式及受聘资料，判断他们为雇员身分。

舞，为助他们为舞展才力。

记者问P，经历一切后，还相信the show must go on吗？ “有动摇。”P说。

把内疚感转为动力

10月，P和其他舞蹈员觉得一定要行动。他们在铜锣湾为阿Mo办生日会，请公众留下祝福字句，想他知道有人在守候。在生日会前，他们终于和阿Mo的父亲见面，得知其近况，“知得愈多愈痛苦，那时他看着天花板，两个月了。”

舞蹈员阿Mo早前一直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目前已转至私家医院。他现时专注接受各种胸肺、脊椎神经、关节肌肉及身体调理的康复治疗，盼能强化机能、体能，和启动沉睡的脑神经。阿Mo的父亲李盛林透露，其康复进度相对快速，现时只要按指示方法吞咽，能进食一般食物。

阿Mo现时的心愿是“能有更大的耐心和投入为康复而战”，但间中也会因不知等到何时而忐忑郁闷。

跳舞的时候，P总有种内疚感、幸存感。“怎可能跳舞？我们凭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伤。”负面想法在舞蹈者的脑海持续扩大，“阿Mo信主，家庭能量很强大，我不断想，是不是他帮我们顶了？我们好想见他，但去了又能做什么？我们双脚站在地上赠庆（幸灾乐祸）吗？”

一些舞蹈员跟他认识时间较长，曾约定一起到红馆表演。在朋友眼中，阿Mo是个比较内歛的人，话不多，但偶尔的发言很幽默；他也是个温暖的人，会常常拥抱相熟的朋友；他坚强和乐观，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要付出什么，也是一个勤力的舞者。阿Mo和同为MakerVille旗下女团COLLAR成员So Ching（苏芷晴）是情侣，事发前常常以情侣档演出。一众舞蹈者跟她也相熟，“女朋友变成老婆角色，你想想压力有多大？”

P说，“这次我们要为同业争取权益，否则阿Mo的受伤……我们要把内疚感转为动力。”

舞蹈员目前整合几个诉求，希望继续跟进事故之余，长远改善行内风气，为表演者提供更多保障。他们希望主办方对外披露其独立调查报告，增加事故透明度；他们也要求艺人管理公司就事故出面回应及承担，不要再让同样受害的MIRROR成员承受压力。

MIRROR近月复工，首次在事故后表演，但不少观众留意到原班底舞蹈员并未参演，团员Anson Lo（卢瀚霆）亦在台上落泪，一度无法演唱。P说，有份参演事故演唱会的舞蹈员，决定拒绝MakerVille的相关工作邀约，“我们不想破坏这个好气氛，我们想复出，比任何都想再次一起享受舞台。但为什么不行？做不到，因为（公司）还没有交代。帮你们做事，会令我们觉得接受了你们以不处理事情的方式去Move on。”

P说，“为什么我们要打烂自己的饭碗？我们也不明白。”截稿前，MakerVille未回应会否按舞蹈员诉求考虑公开内部调查进度，以及就事故出面回应。

另一方面，舞蹈员认为政府调查小组可以调查彩排入台等前期状况，梳理灾难发生的前因后果，并希望舞台安全保障作出根本性改变。P指出，舞蹈业界的从业员大多为自由工作者、零散工身分，保险、合约、工时长短和工作环境等等权益，一直都难以推动。



2022年11月11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雄、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菡，连同调查MIRROR演唱会事故工作小组成员出席记者会交代调查报告。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以往，舞蹈员和雇主习惯在WhatsApp口头倾谈工作内容，“这一行都是口碑挂在前面。”事故后，P眼见不少舞蹈员坚持要正式签约，也有意识要厘清保险由谁安排购买、保额多少等等，“以前我们不知道，原来劳工保险跟自己买的（意外）保险不同，大家都很蠢。”P说。

现在，一些舞蹈员如P希望可以团结更多同行，一同思考未来的行动，甚至酝酿不同的教育讲座。“我不知道是不是工会，但想有一个组织为舞蹈员发声。能走多少步，很难说，但保险一定要做到，再慢慢处理工时、工作环境的问题；甚至想去研究，我们有没有权利和机制去叫停一个表演？”

对于访问，P也忧虑实名发声，或许无法再在舞蹈界找到工作。P指在行内，独立排舞师愈来愈多，以前由几间工作室或制作公司主导工作机会的情况逐渐改善，但怕得罪人、怕被别人取代的风气仍然存在。P也告诉自己，“我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不是想MakerVille倒下来，不是想ViuTV倒下来，从头到尾都是对事不对人。”（编按：ViuTV为香港免费电视台，2022年分拆制作部及艺人管理部组成公司MakerVille。）

创伤过后，有一股公民意识的呼唤鼓励P行动。比起担忧，更让P害怕的是，公众遗忘这一次事故，“我们不想公开信之后，好像没事发生一样。”

跳舞不再纯粹

当P加入MIRROR演唱会的舞蹈团队时，P相当期待。“跟部分MIRROR团员认识很长时间，你们做到明星又那么爆红，我们又终于做到你们的舞蹈员。今次集合几个排舞师也是新景象，真的很期待。”在舞蹈员演出成就的清单上，“今次是MIRROR第一次红馆演唱会，Yes。”

这场演出在P心中一度是完美的。终局的落差，重击了参与这场演唱会制作的所有业者。

现在P觉得跳舞不再纯粹。台上，他们不期然会觉得公众对自己有舞蹈以外的关注，“我们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舞台，还要受公众压力，但我们仍然要笑脸迎人。”P很想问自己，是否还想跳舞？如果还想继续，P会逼自己再到舞蹈班学习，去表演，感受自己和找回热诚。

但最近P满脑子想的仍然是，临近圣诞节，要做些什么让阿Mo感觉到未被众人遗下？

人生第一次踏上红馆，P跑到舞台中央不断转圈、四处张望，“哦，原来站在中央，是这种感觉。”P也永远记得第一次表演，在台上等待黑幕徐徐掉下的时候。开演前5分钟，P的脸紧贴着黑幕，透过一布之隔看到观众浪潮般的灯牌，直至帷幕落下，“你管不到那么多，身体就会自己动。”

P最初喜欢上跳舞，是因为成就感。“年轻时什么都不擅长，朋友懂弹琴、唱歌，我就找些东西玩。接触跳舞后被人赞，又可能真的有天份……好开心，有满足感又有朋友圈。”一直自称没事的P涌出一堆眼泪。“以我们认识的阿Mo，他也应该一样。”

记者问，“现在怎样看跳舞这回事？”

P答：“就是不想放弃跳舞啰。”

（尊重受访者意愿，P为化名。）

